

“个体化”社会中 “延期偿付”青年症候群探析

杨 铨

(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 上海 200444)

【摘要】通常,对暴力犯罪的研究关注的是施暴者的特性与条件。然而,从留学生汪某在浦东国际机场的“弑母事件”引发的巨大社会影响来看,仅仅关注暴力案件的单方面因素是无法准确把握暴力的真正根源。必须从系统和整体的维度,全面评价施暴者的个体因素、分析施暴者个体的成长环境、把握施暴者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帮助我们认清施暴者是如何蜕变到与社会对抗的“个体化”过程。必须重视未成年人在“青年期”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对未成年人个体的心理进行引导,培育未成年人目标意识等正确思想观念,从而降低和减少“延迟偿付”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个体化;青年期;延期偿付;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D917.1 **【文献标识码】**A

浦东机场留学生“弑母”一案震惊海内外,成为一个反响巨大的社会事件,引发出广泛的热议^①。面对公共场所发生暴力犯罪,公众常会感到强烈的不安与恐惧。当得知凶杀发生在“母子”之间时,民众的惊愕与不解之程度恐难以用话语表达。

然而,从这一“弑母”的极端暴力行为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影响来看,仅仅关注施暴者,或者批判社会外部力量——教育的力量,抑或仅仅探讨此案中的“母子关系”,均不能更深刻的理解引发青年发生“暴力”的社会心理根源。本文将此案置于“个体化”的时代背景之下,聚焦于现代青年中的某种症候群——过度“延期偿付”青年群体,对其进行考察,解释引发此“弑母”案发生的社会心理要因,从而试图揭示为何家庭成员之间会发生如此恶性侵犯事件。

一、“俄瑞斯提亚情节(Orestes complex)”的“个体化”转向

(一)为父复仇的“俄瑞斯提亚情节”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弑母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社会禁忌,不过,“弑母情节”即“俄瑞斯提亚情节”,却宛若一个幽灵,长期潜匿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希腊神话《俄瑞斯提亚(Orestes)》中,作为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儿子,俄瑞斯提亚得知是其母亲——阿伽门农的王后克丽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杀死了父亲,为了替其父报仇,得到其妹的帮助,并受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的怂恿,杀死了亲生母亲。随后,俄瑞斯提亚被复仇女神们所追讨,逃入阿波罗的神庙之中祈求得到暂时的安宁,不过仍难逃裁决。最后,俄瑞斯提亚被复仇女神们带到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面前请求裁决。雅典娜召集了众法官,对这弑母的凶手进行了审判。陪审团投票表决的结果却令人为难:半数人认为其无罪,而另一半则相反。于是雅典娜投下了关键性的一票,判定俄瑞斯提亚无罪。然而,复仇女神们不想就此善罢甘休,预言此番审判将给雅典城带来灾难。复仇之火未熄,此事就等于未最终解决。于是,雅典民众答应为复仇女神们建一座神庙,承诺永久纪念她们。复仇女神们一想到将如雅典娜般受到人们的敬拜,深感荣幸,遂放弃了复仇之念。^[1]

在此,进一步引述并阐释这一被称之为“弑母情节”起源的悲剧故事的含义并非本文的重点,不过此故事本身却隐含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弑母”的缘由随着文明的进程,其社会心理

【收稿日期】2011-5-10

【作者简介】杨铨,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社会学系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受2009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关于上海市精神医疗社会工作模式的创新研究”和同年度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关于开展上海市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的基础研究”的资助。

^①自该事件发生以来,“凤凰网”以“留日大学生在机场刀刺生母”为专题,展开了大讨论。

要因也随之逐渐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如果借用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概括，可称为“人的个体化”进程。^[2]（P124）

在古希腊神话之中，俄瑞斯提亚之所以“弑母”，为的是替父报仇——这一行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俄瑞斯提亚并非由于自身受到母亲的压制或虐待，为了维护“自我”权益进行反抗，而是为了替父复仇而鼓起勇气“弑母”。为了替父复仇，他甚至毅然做好了接受死刑裁决的准备，其“为了他者而献身”的意志——即行为中的他者指向是十分明晰的。事实上，在那样一个传统的共同体中，俄瑞斯提亚没有独自生存、为“自我”而活的可能性，也不必有这种能力。按照现代的话来说，他向来就是从类似“我们”的集团视角来思考并展开行动的——因此，他需要妹妹的支持、阿波罗的鼓励。正因为俄瑞斯提亚这一为父献身的精神与“弑母”的罪恶相互冲突，给雅典娜及众法官出了一道难题，最后投票呈现出的民意所优先选择的是消解“仇恨”——让复仇停息，以维护共同体的和谐。

（二）被“个体化”的“俄瑞斯提亚情节”

然而，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开始发现“个体（individuum）”，并使“自我”逐渐觉醒，试着去表达自我的“独特性”^①。此后，“自我”宛如脱缰之马，伴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以“个体化”方式显著呈现出来。这一“个体化”的特征也同样表现在此“弑母”案件之中。汪某在陈述“弑母”理由时，暴露出的正是其“自我中心”的个体化倾向：“母亲表示不会给我钱，还说要钱的话就只有一条命了这种话，我脑子一下子空白，冲上去就捅了她。”

同时，另一不可忽视的外在驱动力则来自于现代的家庭结构的流变。^[3]这一流变产生出诸多无法按传统家庭结构类型确切归类的“问题家庭”，成为引发“弑母”行为的温床。此次“弑母”案中的家庭正是一个现代“问题家庭”的缩影。其家中父亲缺位，远赴美国，也未很好承担儿子的养育责任，案件发生之后仍一直未露面。这么一个父爱功能不健全的家庭，依靠母亲顾某撑起，实现其诸项功能。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如果说，留给未成年人的最大心灵阴影是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情节”的话，那么，在提倡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中，女性在职场上充分活跃，一改昔日温柔持家的传统慈母形象，反而成为缺乏自觉反思的、现代化生产制度的秩序“维持者”，在家庭中成为一股并不亚于父亲、甚至比父亲更为强势的控制力。这股控制力施加到子女身上时，其饱受强迫与压制的子女心灵中自然会滋生出一股难以轻易抹去的“俄瑞斯提亚情节”。这股“俄瑞斯提亚情节”所指向的正是“自我”的复权与“自由”的到来。

二、“个体化”：加剧青年与成人社会之间的冲突

不过，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却并不意味着能够确保青年人能够如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独立的“自我”，反而可能成为青年成长中的一种障碍。正如埃利亚斯所阐释的，“在我们这个文明阶段上，人已高度个体化，人们从自我内在中所感受到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隔阂和一场激烈的对抗，因他们的这种意识转而投射进了世界；……隔阂就被当成人的存在性隔阂，对抗被当成个体与社会之间永恒的对抗。”^[2]（P29-30）这一对抗中，未迈入社会的青年人始终在对抗中处于劣势的那一端。

（一）“个体化”社会中的“隐蔽青年”

这种排斥造成了至少两个主要后果。一是这群青年人从现代社会的实际生产劳动的现场被区隔出来。同时，来自成人社会，主要是家族的经济支援使得他们获得了过上一种特殊的、由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个人选择个体的消费，同时在不同场合形成相同趣味的青年人们创出了一种被称之为“青少年文化”的现代消费文化形态。这一种“消费文化”的形态也表现出极强的“个体化”的特征。这一过程，随着收音机、电视机从“家电”变为

^①在拉丁文中，“个体（individuum）”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才逐渐被概念化出来的。可参见《个体的社会》，翟三江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166页。

“个电”的过程中就可一窥端倪。^[4]进入网络时代以来,青少年群体表现出的独自一人看喜爱的节目、独自一人上网娱乐、购物消费的所谓“个体视听”、“个体消费”的行为模式进一步加剧,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形成了一种“隐蔽青年(Hikikomori, social withdrawal)”症候群——难于与人沟通、对现实社会也缺乏兴趣、拒绝进入团体的一群自闭倾向的青年人。^[5]在现代日本,“隐蔽青年”群体规模庞大,这群消极“宅人”成为社会问题被广泛关注。而“隐蔽青年”可能导致“暴力凶杀”的事实,则因1997年发生在日本神户市须磨区的一起14岁中学生杀害并肢解了一名小学生而成为日本社会的普遍认识。有研究者认为,个人(体)化已“构成青少年社会化的严重障碍”。^[6]据报道,弑母案中的施暴者汪某原本开朗,在大学二年级之后,“变得不喜欢跟别人交流,而是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上网”,可以说呈现出“隐蔽青年”的主要特征。^[7]

(二)“个体化”社会中,青年心理与社会的冲突

另一个后果则表现在青少年自身的“心理”变化之中。在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严峻的专业化、复杂化有增无减的情形之下,未成年人所要投入在学习、训练上的过程被拉得愈来愈长,而为自立和独立所做出决断的道路也变得漫长而复杂了。这一介于未成年状态与社会化的成年状态的“中间年龄期”的不断延长,给青年个体带来了重重困难。在这一情形之下,“个人无法在他自己的特长,在他自身的自我规范和他的社会责任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2](P128)正如埃利亚斯所揭示的,“一种内在的紧张和分裂”在青年个体的心灵世界中格外加剧。^[2](P31)主要表现在,在青年人精神世界里,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消解的隔阂。社会常常给青年人的意愿和志趣并不是容纳与鼓励,而是一种难以消除的对抗。

这一对抗之中,通常均以“社会”告赢而终结。埃利亚斯对此有一绝妙的比喻:“社会”这个词本身常常被人们使用得好像它是指某一个人。这么一使用,它往往就具有做了母亲的人的那种角色特征,它扮演的的是一个冷酷的、有敌意的,并且爱管这管那的掌权者角色,孩子从她那里得到的是拒绝,并且不得不将自己喜欢做的、喜欢表现和表达的收敛“在内心里”。^[2](P131)这一比喻十分启发我们透视“弑母”青年的社会心理要因——在汪某“弑母”案中,其认知分裂正是表现在,他已经模糊了“母亲”与“社会”的界限。汪某在漫长而孤独的留学生活中,定然受到来自异国社会的无数严峻的规训,同时也有来自母亲的急切的期待。而这些都在其精神世界的紧张与分裂中,蜕变成为迈入不了成人世界的巨大压力。当这些压力与日俱增而无法消解之时,冲动中的他只好举起了手中的凶器。这一柄刀不但刺入了母亲的身体,同时也象征着刺入了“社会”的机体之中。

三、“延期偿付”青年症候群的诞生

现代社会中的“青年期”犹如埃利亚斯所说的被延长的“中间年龄期”,是一段十分值得关注的时期。按照Chisholm与Hurrelmann对比1890年与1990年的青年群体的生命历程研究发现,确切的说,现代青年与一百年前(研究展开的当时)的青年相比,在向成人跨越之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延迟”了,一部分事情却“提早”到来——分别是进入学校的年龄、寻找性伴侣的时期以及“非婚同居时期”;而另一部分事情被“延迟”了,主要有“学校教育结束的时期”和“进入职业生涯的年龄”。^[8]这一实证研究的结论一方面印证了埃利亚斯对“中间年龄期”的推测,同时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对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延迟偿付”及其意义

在埃里克森看来,青年期是“疾风怒涛”的时期,充满着危机——一种因“同一性混乱(扩散)”而引发的危机。所谓同一性混乱也就是通常所指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状态。这一阶段的危机如果不加克服,青年个体不但无法顺利跨越入下一阶段,如期去建立起亲密感,反而会陷入孤独,甚至有“退行”返回到儿童状态的危险。按

照埃里克森的划分，“延迟偿付（moratorium）”可划分为三个维度：社会心理的（psycho-social）、性心理的（psycho-sexual）及历史的（historical）延迟偿付。尤其是社会心理的延迟偿付时期是指，在生理上、智力上已经基本成熟的青年个体，通过发现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并尽可能对自我予以恰当的定位的一个准备时期。在埃里克森看来，社会有必要给青年提供这样一个制度化的延迟偿付的时期，以便援助青年克服困难，顺利度过这一危机。^[9]

因此，在这一点上，一些心理学家则认为，对于青年来说，这一时期并非是一个仅仅充满危机的时期。积极看待“延迟偿付”的学者赞成社会应当援助青年，支持他们“平稳”度过这一时期。这一学说认为，正是现代文明的进步，才使得青年拥有了远比传统社会更为自由、更为充分的去发现“我是谁”、“我能做什么”的时间。同时，青年人面对充满激烈变化、不确定性增多的社会，也不易过早地自我定位、甚至自我限制，而是要积极利用这一“延迟偿付”的时期，以积极探索自我的多种可能性为前提，展现出争取顺应社会变化、塑造全新自我的姿态。^[10]因此，积极意义上的“延迟偿付”时期旨在为青年提供选择的“自由”，使之能够找到自己最适合施展才华的领域与发展的机会。

（二）“延迟偿付”的青年征候群

然而，现实社会并非如埃里克森等学者所设想的那样，社会建构一个“制度化”的、理性的“延迟偿付”的时期。问题出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化与复杂化确实使同一性的形成阶段被推迟了若干年，导致无法跨越“延迟偿付”时期的青少年不断增多，反而引起了过度“延迟偿付”的问题。这群年轻人并不愿意面对众多成年人所必须面对的严肃选择，对成年生活中的各种角色，如职工、配偶、父母、公民等任何角色都不主动作出任何承诺，在他们眼里“把结婚、家庭、孩子看做是要避免的危险，而不是要追求的成就”。^[11]

过度“延迟偿付”的青年人已不在少数，成为一种典型的症候群。这群人呈现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特性。首先，他们的内心充满焦虑。表面上，一副不屑烦恼，什么都好的神态，其实内心却因自我发展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陷入“焦虑”^①。一种不可能无限延迟的认知和已经过度“延迟偿付”的自身现实之间相互冲突，导致其心理成本增加；而延迟承诺担当成人社会中的角色则成为其焦虑与情绪低落的主要根源。其次，他们呈现出一种拒绝成熟的“自恋”情结。极端的状况会导致“退行”，出现“幼儿化青年”，他们拒绝长大、任性自私，类似于“彼得潘综合症（peterpan syndrome）”所描述的那样。当然，最严重的特征是来自于这群青年没有具体而清晰的目标，没有目标也是现代青少年的一种特征。有调查表明，12岁至22岁的青年人中每5人中只有约1人能够说出清晰的人生方向。因此，斯坦福大学的William Damon认为，青年期的不满、焦虑与无确定目的的生存方式相关。

从上述视角分析，23岁的汪某就是“延迟偿付”青年症候群中的典型一员。他虽赴日留学，但一度曾提出“不想念书”，留学目的并非来自自我认同或职业规划，表示只是为了文凭才未退学，勉强继续；相反，作为学生，其个人消费却可谓大手大脚，入住房租高达1.2万元（人民币，下同）/月的公寓，此外每月生活费大概在1万多元，两项合计每月生活总支出就超过2.2万元。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日本大学生每月的平均生活总支出费用折合人民币约为1.08万（13万日元），即使在全球物价最高的区域之一——东京地区求学，大学生的平均生活费用是1.14万元左右（14.2万日元）。^[12]比较可见，汪某的消费竟然是日本大学生月平均消费额的两倍以上。

因为没有明晰的目标与规划，过度“延迟偿付”的青年人即使处在学习期，对所学的专业也并不积极主动投入，有时甚至打退堂鼓；过度“延迟偿付”的过程中，却因“自恋”而去

^①从实存主义的角度看，“焦虑”可能是现代人的一种普遍状态，在青年群体身上尤为显著。现代自我被焦虑困扰，源自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自由其实就是一种“焦虑”，即一种没有对象、场所，甚至没有方向的“无知”的状态（参见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1987版）。

追求物质与感官上的享乐，出手大方、花费不菲，陷入不惜啃老来支持“个体消费”的陷阱之中。然而，物质与感官的享乐所带来的满足感总是短暂的，随后袭来的空虚和焦虑情绪无法及时拂拭，久而久之对自己感到失望，对生活感到沮丧，最终陷入深深的绝望。一旦有某些事情，哪怕是一件小事，可能阻碍其“延迟偿付”期的继续或伤害到其“自恋”情结，就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引发其对既存社会规范与道德法则的无视，对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人采取残酷的暴力手段。

四、结语：援助青年树立“目的意识”

可见，日益专业化、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对于青少年来说，充满各种危机，是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最不易使其“成年”的社会。“个体化”社会导致他们的“中间年龄期”被延长了；青年人过度“延迟偿付”的后果将导致“自我同一性”的扩散；另一方面，“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时代，则极易催生出只知享乐的“回巢族”——他们持续啃老，而又被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吓倒，迟迟不肯独立。不适应社会的变动，导致过度“延迟偿付”青年在社会、心理上的孤立，而倘若又过度“自恋”、“自我中心”，那么出现失败或者些许挫折时就会倾向于责备“他者”——甚至行凶。

既然，我们能够解读这一“个体化”社会背景之下的“延迟偿付”青年症候群所存在的问题，那么面对这群青年人，如何去援助他们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做法是通过各种渠道去援助他们树立起“目的意识”。父母应当认识到，帮助他们的孩子制定积极的人生规划是其重要责任之一，而不是仅仅提供他们物质上的支持。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应该意识到，青年人光有“动机”是不够的，更需要使他们逐渐明确具体的努力“方向”，树立起获得未来幸福生活的坚定目标。这一点上，社会工作者可以依据社会工作专业理论，通过小组、个案等工作方式有效介入，对过度“延迟偿付”的青年人进行心理社会评估，通过提供有效的精神健康援助和心理干预，使案主自觉确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切实做到这些，那么，这一群体的青年将最终能够在“延迟偿付”时期克服失望、焦虑与消沉，避免失范、获得积极发展的动力，顺利跨越这一“危机阶段”的。

【参考文献】

- [1] 埃斯库罗斯. 俄瑞斯提亚/埃斯库罗斯悲剧集[M]. 陈中梅译, 沈阳: 辽宁出版社, 1999.
- [2] 埃利亚斯. 个体的社会[M]. 翟三江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124.
- [3] 刘宝驹. 现代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变化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0, (6).
- [4] 長谷川公一等編. 社会学[M]. 東京: 有斐閣, 2008.346-348.
- [5] 齊藤環. 社会的ひきこもり: 終わらない思春期[M]. 東京: PHP新書, 2002; 敦訪真美. 今日の日本社会の「ひきこもり」現象[J]. 医療福祉研究. 2006, (2).
- [6] 陈映芳. 个体化与日本青少年问题[J]. 社会学研究, 2002, (2).
- [7] 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liuxueshengcimu/content-2/detail_2011_04/12/5689299_0.shtml.
- [8] Chisholm, L., & Hurrelmann, K. (1995). Adolescence in modern Europe: Pluralized transition patter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ersonal and social risk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8, 129-158.
- [9] 埃里克森. 同一性: 青少年与危机[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 [10] 小此木啓吾. モラトリアム人間の時代[M]. 東京: 中央公論新社, 1978.
- [11] William Damon, (2008) *The Path to Purpose: Helping Our Children Find Their Calling i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12] 大学生の1か月、生活費はいくらかかる? 旺文社 (<http://www.obunsha.co.jp/>) 調査.